

清代的後山詩評與詩史定位

吳淑鈿

提 要

陳師道的詩在宋代的評價十分正面,元代方回更力舉為江西三宗之一,明代則其人其詩,毀譽參半。至清代,後山詩鮮見好評,論者指為惡詩、鈍根、枯槁、無味,乾隆間,只紀昀間有持平之論。到近代,同光體詩人纔將他放入中國古典詩歌的源流發展中,作風格的正面肯定,予以唐宋詩史的重要席位。本文擬考察清代以來的後山詩接受史,希望釐出有清一代,後山詩在眾多的負面評價中流傳下來的曲折過程,對清代宋詩學的研究作重要補充。

關鍵詞：瘦硬樸拙 鈍根 守道固窮 唐宋詩史

陳師道的詩在宋代的評價十分正面,元代方回更力舉為江西三宗之一,譽為善於學杜。明代貶抑宋詩尤其江西詩風,從學杜考察後山詩得失,其人其詩,毀譽參半。至清代,自王夫之等開始,後山詩鮮見好評,論者指為惡詩、鈍根、枯槁、無味,乾隆間,只紀昀間有持平之論,到近代,同光體詩人纔將他放入中國古典詩歌的源流發展中,作風格的正面肯定,予以唐宋詩史的重要席位。本文擬考察清代以來的後山詩接受史,希望釐出有清一代,後山詩在眾多的負面評價中流傳下來的曲折過程,對清代宋詩學的研究作重要補充。

清代的後山詩評有何研究價值? 後山詩作為宋詩的一個重要代表,清代前後的評價差距極大。清代以前,後山詩以學人詩風稱於兩宋,被認為格高意

深,平淡自然,詩人的忠厚有節、守貧樂道更受時流推重。呂本中建江西宗派圖,列後山爲法嗣之一,以其源流出於山谷。南宋葛立方指出後山格律高古,讀杜詩熟而多點化杜語。¹ 嚴羽認同後山有語似杜者,但有自家面目,故建後山詩爲一體。² 元代方回爲鞏固江西壁壘,樹立“一祖三宗”的詩學系統,將“宋詩之冠”的山谷與後山及兩宋間的簡齋並列,以爲專師老杜,天下詩人不可及。³ 此後,關於後山詩的評價,主要圍繞於方回的“一祖三宗”定位之上,包括後山的學杜與山谷及簡齋學杜的高下比較,歷明清兩代而論述不斷,且越見貶抑之甚。明代論者雖猶有從知人論世的角度肯定後山其人的,如“矯厲凌烈,窮餓不悔”,⁴ “高介有節,安貧樂道,奧學至行”,⁵ “有道德史才”等,⁶ 但在唐宋詩之爭的重唐氛圍中,對後山詩並未予以好評,如王世貞指爲“點金成鐵”;⁷ 以胡應麟爲代表的復古派後期詩論家,認爲後山學杜未精,因爲杜詩盡得古今體勢,而後山以險瘦生澀爲杜,只得其骨,雖有自家面目,終出爲一代之弊的宋體。⁸ 《詩藪》對後山體的詮釋,強調“瘦勁”“老硬枯瘦”等典型宋詩特質,成爲清人檢視後山詩藝術風格時的論述根據,但清人的關注點,其實是放在比較蘇、黃或黃、陳或二陳的高下問題上,當然,爭議的歸宿,是仍回到江西“三宗”的地位確立上;“一祖”與“三宗”及“三宗”之間的離合關係,是明清以

1 葛立方：《韻語陽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卷2，頁3。

2 嚴羽：《滄浪詩話·詩體》有“後山體”，下注云：“後山本學杜，其語似之者但數篇，他或似而全，又其他則本其自體耳。”郭紹虞：《滄浪詩話校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頁59。

3 方回：《瀛奎律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卷1，頁14。

4 楊一清：《弘治袁宏本後山詩注跋》，見《後山詩注補箋》“序跋題記”（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602。

5 舒芬：《舒梓溪文鈔·四賢堂記》，載傅璇琮編：《黃庭堅和江西詩派資料彙編》（下）（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546。

6 郎瑛：《七修類稿·詩文類》（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卷29，頁445。

7 王世貞：《藝苑卮言》，載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卷4，頁1019。

8 胡應麟《詩藪》外編卷5云：“宋之學杜者，無出二陳，師道得杜骨，與義得杜肉。”“二陳五言古皆學杜，所得惟粗強耳……大抵宋諸君子以險瘦生澀爲杜，此一代認題差處，所謂七聖皆迷也。”載吳文治主編：《明詩話全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冊，頁5616、5612—5613。

來唐宋詩之爭中最重要的論述課題之一，牽涉唐宋詩的優劣及宋詩的本質體認。無論如何，一黃二陳作為宋代有代表性的詩人，他們的文學成就都能名顯當世，宋代以後的“際遇”卻不一，三家中，祇山谷詩受到較大的肯定，簡齋詩因有近唐的成分，亦有被區別對待的機會，獨後山詩如其人，長久寂寞，乾嘉後纔稍見持平之論，終清一代仍未得全盤之肯定。然則清末以來，我們從文學史中所認識的後山詩的源流風格，到底是以怎樣的曲折過程流傳至今而為後世所認識？清代的後山詩史地位的起落，值得深究。

後山的詩史地位變化，其實側面反映了清代的宋詩接受過程。由錢謙益開始，清人一直廣泛接受的宋代詩人或是蘇、黃，或是陸游，其中蘇黃更長期被視為宋詩的最高代表，觀乎三家詩風的共通點，是氣與力的表現，可謂符合清初走向乾隆盛世的文化願景追求。而後山詩的樸拙枯淡即使在唐宋詩之爭中，在宋詩逐漸成為傳統詩學的一個典型時，也沒能得到多少看重，這呈現清人藝術審美心理的一面。咸同後社會衰敗，時代精神不如昔日，詩家在文學史的回顧中，纔把後山詩重新發掘出來，予以定位。本文擬分三期考察後山詩在清代由負面至持平至確立地位的詩史評價，也藉此體認不同階段中，宋詩風格的接受角度。

一

方回並稱黃、陳為宋詩之冠，清初以來，後山詩卻沒能和山谷詩同受推崇，相反的是鮮見獲得正面看待。後山恒常處於一種被比較的狀態中，無論在“一祖三宗”間的學杜關係上和山谷的較量，或與清初所認定的宋詩代表“蘇、黃”之互見，都有不及。此期後山詩的負面評價，反映出他不符時代文化精神的期望，詩史地位比諸宋代，一落千丈。

後山學杜得法，其說始自黃庭堅，滄浪認同其詩有似杜的部分，方回標舉為學杜“三宗”之一，胡應麟指他只以瘦硬為杜。比之前人，清初唐詩派都一筆抹殺，以為不可。宋詩派則多論蘇黃，後山未受注目，稱許的更寥寥可數，將他與山谷並舉的，僅康熙間汪琬（1624—1691）《讀宋人詩五首》（其一）：“夔州句

法杳難攀,再見涪翁與後山。留得紫微圖派在,更誰參透少陵關?”⁹ 此外就只有早期致力推動宋詩的吳之振(1640—1717)等於《宋詩鈔·後山詩鈔序》中引山谷語而譽之極高:“其詩深得老杜之法,今之詩人不能當也。”又說:“任淵謂……非冥搜旁引,莫窺其用意深處,因為作注。蓋法嚴而力勁,學贍而用變,涪翁以後,殆難與敵也。”¹⁰ 並由典重意深、講法度、有筆力等方面,按方回的“一祖三宗”格局,予以全盤肯定。但《宋詩鈔》刊行前後,宋詩其實並未流傳開來,後山詩這些藝術表現亦未得時人的認同。

清初晚唐派對後山最為敵視,用紀昀的說法,二馮是“疾後山如仇”。¹¹ 觀二馮的後山詩點評,主觀直截,皆指“太僻”、“太牽強”(評《和黄預久雨》)。馮班(1602—1671)說:“枉學杜”(評《立春》),“句晦”(評《晚泊》),“用得無理,湊句也”(評《次韻何子溫祈晴》),“用事不妥”(評《次韻李節推九日登山》)。馮舒(1593—1645)說:“太衰颯”(評《除夜》),“抄昌黎,醜甚”(評《和黄預七夕》),斷言“後山再起,吾亦不服”(評《寄無斁》)。馮班解釋他們兄弟不服後山的原因:“後山不讀齊梁詩,只學子美,所以不得法。子美體兼古人,黃、陳不知也。”(評《寄無斁》)“效杜之極,然未肖也……後山自杜以上都不解,往往結不住,以為學杜,正在皮膜之外也。”(評《暑雨》)可見他們最不滿後山詩的典重,不學齊梁,失辭藻之美,只算學杜得其皮。賀裳(約1681)點評後山詩,也指後山五律雖有氣格近杜之處,亦只“優孟抵掌似耳”(《載酒園詩話》卷5)。晚唐派反對後山詩的典重古澹,江西詩派的奪胎換骨是他們深惡痛絕的。

同樣性質的劣評亦見於主詩由張情性的王夫之(1619—1692),他以後山詩“刻意冥搜,止墮蠶鹽窠臼”,貶為“似衲子”的“惡詩”之一。¹² 薑齋貶抑後山

9 汪琬:《堯峰文鈔》,載《四部叢刊初編·集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89冊,詩卷5,頁57。

10 顧廷龍主編:《詩歌總集叢刊·宋詩鈔》(上海:三聯書店,1988年),頁152。

11 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彙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中冊,卷42,《寄外舅郭大夫》,頁1501。以下二馮各評見同書。《和黄預久雨》,頁670;《立春》,頁376;《晚泊》,頁549;《次韻何子溫祈晴》,頁696;《次韻李節推九日登山》,頁636;《除夜》,頁573;《和黄預七夕》,頁633;《寄無斁》,頁667;《暑雨》,頁668。

12 王夫之:《薑齋詩話》,卷下,載丁福保編:《清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頁21。

和蘇、黃沒有分別，後二者被他同列為“癩祭魚”：“除卻書本子，則更無詩。”¹³事實他既反對宋詩，更反對江西詩派。不滿前者的是宋詩講“出處”，¹⁴不滿江西則是因為他反對“建立門庭”，認為門派一旦建立，便會桎梏詩人的才情，這和他主性情的詩學觀有關。¹⁵薑齋和晚唐派相同的是反對後山詩以學問為詩，不同的是，他從根本上否定宋詩及江西詩派，是因不滿興觀群怨的傳統風雅失落，所以也沒觸及後山與山谷如何學杜的問題。

至於沿明復古派而宗唐的毛先舒（1620—1688）本來就反對宋詩，主張“詩固不可率爾下字，當使法格融渾，雖有字法，生於自然。自宋人詩眼之說，摘次唐人一二字，酷欲仿效，不能益工，只見醜耳。”¹⁶《詩辨坻》卷三評後山詩句“功名欺老病”的“欺”字有“露筋”之病，¹⁷病其下字有不自然之弊，也是否定宋詩的講究烹鍊。一生出入唐宋而以唐詩為重的王漁洋（1634—1711）在《池北偶談》中沒有在“三宗”的框架中論後山學杜，但在學杜的問題上，他把“三宗”分別列在三等中，而後山居次：“宋明以來詩人學杜子美者多矣，予謂退之得杜神，子瞻得杜氣，魯直得杜意，獻吉得杜體，鄭繼之得杜骨。它如李義山、陳無己、陸務觀、袁海叟輩又其次也。陳簡齋最下。”¹⁸又認為後山缺悟性：“予反復其詩，終落鈍根，視蘇、黃遠矣。任淵云無己詩如曹洞禪，不犯正位，切忌死語。恐未盡然。”¹⁹比蘇、黃遠有不及。漁洋論詩，於蘇、黃不乏欣賞之意，除了學杜

13 同上，頁 17。

14 《薑齋詩話》中每見“出處”之評：“宋人搏合成句之出處，役心向彼掇索，而不恤己情之所自發，此之謂小家數。”“作詩亦須識字……唐人不尋出處，不誇字學，而犯此者百無一二。宋人以博核見長，偏於此多誤。”“必求出處，宋人之陋也。其尤酸迂不通者，既於詩求出處，抑以詩為出處，考證事理……求出處者，其可笑類如此。”載丁福保編：《清詩話》，頁 8、13、17。

15 薑齋反對建立門庭，和他主性情的詩學觀念有關：“纔立一門庭，則但有其局格，更無性情，更無興會，更無思致；自縛縛人，誰為之解者？”“立門庭與依傍門庭者，皆逐隊者也。”“立門庭者必鉅釘，非鉅釘不可以立門庭。”“建立門庭，已絕望風雅。”載丁福保編：《清詩話》頁 15、17、19。

16 毛先舒：《詩辨坻》，載丁福保編：《清詩話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卷 1，頁 12。

17 同上，頁 67。

18 王士禛：《帶經堂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 年），卷 1，頁 20。

19 同上，卷 10，頁 222。

各有所得,詩文書畫亦時有並稱。三宗中,他特別稱許山谷的“才力學識”,²⁰認為山谷力學古人,以之強配杜詩或江西詩派都未算恰當,故云“強將配饗杜陵人”、“未許傳衣躡後塵”(《戲效元遺山論詩絕句三十六首》)。相對之下,他鄙薄後山為鈍根,不同意任淵的活參解讀之見,是意在後山才力不足,欠缺性靈抒發的空間,不見神韻。至於二陳學杜而後山稍勝簡齋,是因為後者簡嚴雄渾的語言風格和漁洋的藝術趣味離得更遠,故居最下。²¹

唐宋調和派的查慎行(1650—1727)重視學問為詩,於《初白庵詩評》中,和清初多數論者一樣,著眼於後山詩的典重,“精於內典”(評《元日》),“用事費解”(評《和黃預久雨》),²²又學杜之句法,“未免生吞活剥之譏”(評《次韻晁無斁》),與山谷相比,以為略有不逮:“後山詩樸老孤峭,在江西派中,自當首出,只讓涪翁一頭地耳。然謂其學杜則可,謂其學杜而與之俱化,竊恐未安。”(評《登鵲山》)“方虛谷於後山詩推重太過,平情而論,其力量尚不及涪翁,何況子美。”(評《鉅野》)認為只稍勝簡齋:“簡齋與後山才力相近,而烹煉不及後山。”(評陳與義《渡江》)歸納各條,可見初白是在江西的框架中論“三宗”高下,後山不如山谷,簡齋不如後山,是才力等差的問題。他雖不以後山學杜為有得,但表現了論詩不分唐宋的調和派本色,既指出後山詩即使有用事和句法之弊,但具備“烹煉”的創作特點,和“樸老孤峭”的藝術表現,這種認識,在清初唐詩派影響籠罩一時的階段,已比前人踏出一大步。

綜觀清初,後山詩的詩史地位低下,這和唐詩派是詩壇主流有關,即使其時鼓吹宋詩的詩家,也多稱許山谷學杜,而絕少提及後山詩。參考此期的山谷詩評可作補充。山谷詩主要是在“蘇、黃”的典範意義上得到詩壇認同,和東坡並為宋詩最高代表,即使對江西大表不滿的晚唐派,也承認山谷重要詩史地位,如賀裳說其詩有“清空平易”者。²³ 吳喬(1611—1695)更云:“宋詩之最高

20 王士禛:《黃湄詩選序》,《帶經堂集·漁洋文二》,《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集部,第1414冊,頁320。

21 吳淑鈿:《一祖三宗說與陳簡齋的詩學定位》,《學術研究》,2014年第2期,頁140。

22 《初白庵詩評》,見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彙評》,《元日》,頁577;《和黃預久雨》頁670;《次韻晁無斁》,頁377;《登鵲山》,頁15;《鉅野》,頁1398;陳與義《渡江》,頁20。

23 賀裳:《載酒園詩話》,載丁福保編:《清詩話續編》,上冊,頁432。

者蘇、黃，終是宋詩之最高者。”²⁴倡宋詩者如吳之振更是高舉“詩到蘇黃語益奇”（《論詩偶成》），²⁵宋肇（1634—1714）與田雯（1635—1704），亦並稱蘇、黃，以爲皆“以少陵爲歸墟”，又曰：“學杜者……子瞻、魯直……各自成家。”“東坡、山谷……之學杜，形體不具，神理無二矣。”²⁶指蘇、黃學杜成家，在於得其神理而非只外在皮膜。其中宋肇調侃朱彝尊的學杜頗見趣味，他說竹垞平日論詩不滿山谷，“今諸什大段學杜，而高老生硬之致，正得涪翁三昧”。²⁷可見當時無論宗唐宗宋，都甚推尊山谷，甚至不自覺地學習起來。再看喜用僻字僻典的浙派陳訐（1650—1732）的《宋十五家詩選·山谷詩選序》：“黃山谷詩，語必生造，意必新奇，想力所通，直窮天際，宜與眉山頡頏。”²⁸亦極力標舉山谷詩。論詩宗仰漁洋的王應奎（1684—1757）反對二馮於“黃、陳之作，塗抹幾盡……余謂江西一派，雖不無可議，然涪翁之作，即東坡亦極賞之，何至詆毀若是”，²⁹更可印證黃、陳其時往往被分別對待，山谷爲蘇、黃並稱的宋詩代表，塗抹幾盡的，其實只是後山詩。後山可謂數面受敵，比較山谷，他有所不及，比較蘇、黃，他離得更遠，而當蘇、黃同被貶抑時，他亦不免。總的來說，清初在蘇、黃的高大身影下，後山詩了無顏色。論者於“三宗”只獨標山谷，以爲後山才氣筆力都不如，故與杜詩關係更疏離；王夫之和王漁洋的後山詩評，都觸及情性及才氣的創作問題，這從側面反映出唐詩派的詩學觀，和他們不認同方回“一祖三宗”的立場。其次，清初詩家無論宗唐宗宋，針對明末的空疏風氣，其實都沒有反對以學問爲詩。對後山詩的典重不假辭色，是因爲山谷用典而能奇崛創新，後山卻枯淡樸拙，少了一份詩力。宋肇的“高老生硬”和查慎行的“樸老孤峭”正反映此期論者對黃、陳詩風的體認角度。清初知識分子希望在易代之後，建立理想社

24 吳喬：《圍爐詩話》，載丁福保編：《清詩話續編》，上冊，卷5，頁606。

25 吳之振：《黃葉村莊詩集·後集》，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集部，第237冊，頁807上。

26 宋肇：《漫堂說詩》，載丁福保編：《清詩話》，上冊，頁418。田雯《古歡堂集·雜著》，卷1，載丁福保編：《清詩話續編》，上冊，頁692。

27 宋肇：《跋朱竹垞和論畫絕句》，《西陂類稿》，卷28，載《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集部，第1323冊，頁321上。

28 陳訐：《宋十五家詩選》，載《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621冊，頁425上。

29 王應奎：《柳南隨筆》（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卷3，頁58。

會,以雅正爲詩教,注重唐詩,即使言宋,也只接受“高者師法蘇、黃”,³⁰其餘多受貶抑。後山的“樸”有別於山谷的“高”,與唐詩的雅有著距離,故這階段評價負面,詩史地位不昭,有志收藏圖書的錢曾(1629—1701)說後山詩任淵注本乃“注家之絕佳者,而傳之獨少”³¹可爲例證。

二

清代中葉,乾隆至道光早期約百年間,詩家已不復獨尊唐詩,而是承認宋詩爲另一詩史典型,標誌著文化觀念轉爲兼容並包,具有較開闊的時代氣象。這階段蘇、黃仍是宋詩代表,後山漸受注目,文學史地位稍見提升。

乾隆早期,唐詩派沿清初風氣,仍貶後山於“一祖三宗”的框架內,而不薄宋詩者,亦未確認後山於詩派或詩史中的地位。晚年深受朝廷賞識的沈德潛(1673—1769)及論詩同重格調的喬億(1701—1788)由宗唐角度,指出無論黃、陳或二陳都不善學杜。“西江派黃魯直太生,陳無己太直,皆學杜而未嚼其腠者。”³²“宋之後山、簡齋五律宗杜,皆粗硬乏溫醇之氣。”³³王昶(1724—1806)是沈氏門人,亦語出同調:“宋黃魯直、陳後山諸君,瘦硬通神,不免失之粗率。”³⁴可見宗唐派都把後山和“二宗”並論,指爲粗硬。而調和論者如全祖望(1705—1755),在《宋詩紀事序》中敘江西之變,只推山谷,未把後山列入江西

30 朱彝尊:《曝書亭集·葉李二使君合刻詩序》,載《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318冊,頁83上。

31 錢曾:《讀書敏求記·詩集》(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4年),頁137。後山詩集自宋元以前已分有(任)注及無注兩種,任注本又比無注本少得多。清代康熙時有何焯的校本,引入不少任注,乾隆時錢泰吉(1791—1863)《校陳後山集跋》云:“後山之文,世鮮誦習者……舛錯處篇篇有之,非得義門校補,幾不可讀。”載《甘泉鄉人稿》(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年),第1冊,卷5,頁230。清代至乾隆時纔有武英殿聚珍本《後山詩注》。後山詩集的版本流傳見《後山詩注補箋》的“版本源流表”,頁627—628。

32 沈德潛:《說詩碎語》,載郭紹虞主編:《原詩·一瓢詩話·說詩碎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卷下,頁235。

33 喬億:《劍谿說詩》,載丁福保編:《清詩話續編》,卷下,頁1093。

34 王昶:《春融堂集》,載《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438冊,卷32,頁22上。

詩派以至北宋以來諸大家中。³⁵ 同期姚燮《宋詩略自序》論唐宋之變，後山躋身學杜諸名家中，但並不列入“黃涪翁之派”。³⁶ 反映其時論者在勾勒唐宋詩之變時，都未給予後山於一代或一派中以重要的詩史地位。

紀昀(1724—1805)論詩，雖也站在宗唐的官方立場，但終清一代，紀氏是對後山詩審視最全面，且能予以獨立看待的論者，這和他編纂《四庫全書》和門戶觀念比較寬容有一定關係。他的後山詩綜論載於《四庫全書提要》中，點評則見於《瀛奎律髓刊誤》中對方回的辯駁。前者包括辨體及後山學杜高下，是紀昀江西詩論的一個組成部分；後者是對後山詩風的微觀體認，雖仍見貶語，但切實持平，觀點有傳承及啓示意義，後山的詩史地位由此稍得提升。值得注意的是《四庫全書提要》與《瀛奎律髓刊誤》外，乾隆二十九年(1764)，紀氏在所編《鏡烟堂十種》中錄《後山集鈔》，序云：“考江西詩派以山谷、後山、簡齋配享工部，謂之一祖三宗，而左袒西崑者，則掎擊抉摘，身無完膚，至今呶呶相詬厲。”又自敘輯錄後山詩緣由：“余雅愛其文……又念其詩珠礫混雜，徒爲論者所藉口，因嚴爲刪削，錄成一編，非曰管窺之間可以進退古人，亦欲論後山者核其是非長短之實，勿徒以門戶詬爭，閔然佐鬪，是則區區之志焉耳。”³⁷ 說明在唐宋詩門戶之爭中，後山詩的優劣未經核實而徒被貶抑，故欲作平心之論。序中各體之評，與《後山集提要》互見，主爲後山詩明辨優劣。概括言之，後山五古剗削堅苦，生硬杈桎，不免江西惡習；七古學韓、黃，粗直拗折，開合少變化；五律蒼堅瘦勁，是最近杜甫之體；七律風骨磊落，但太快太盡；五七絕則未得杜之十一。³⁸ 他爲後山體作出歸納：“大抵絕不如古，古不如律，律又七言不如五言，棄

35 全祖望《宋詩紀事序》論宋詩之變，歐、梅、蘇、黃之後，以江西爲“又一變”，但江西只推山谷爲代表：“涪翁以崛奇之調，力追草堂，所謂江西派者，和之最盛，而宋詩又一變。”全祖望：《鮚埼亭集》，載朱鑄禹彙校集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外編卷26，頁1246。

36 姚燮論宋人學杜：“又若王介甫之峭厲，蘇子美之超橫，陳去非之宏壯，陳無己之雄肆……黃涪翁之派有三洪、二謝、陳、潘、汪、李之輩，俱宗仰浣花草堂，或得其神髓，或得其皮骨，而原本未嘗不同。”見傅璇琮編：《黃庭堅和江西詩派資料彙編》（下），頁566。

37 紀昀：《後山集鈔序》，載《紀曉嵐詩文集》（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年份從缺），卷3，頁159。

38 《後山集鈔序》，載《紀曉嵐詩文集》卷3。《後山集提要》載《四庫全書總目》，《萬有文庫》（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年），第39冊，卷154，頁7。

短取長,要不失爲北宋巨手。”³⁹在胡應麟的五律得杜骨之說上,紀昀補充了後山非只瘦勁似杜,更在於“其間意僻語澀者,亦往往自露本質,然胎息古人,得其神髓,而不自掩其性情,此後山所以善學杜也”。⁴⁰ 既得杜詩之神髓,且有自家風貌,肯定後山有可觀的部分,故云“要不失爲北宋巨手”。

縱觀紀昀的詩體論,後山詩風不離宋調,生硬、拗折、快直、瘦勁等,但藝術表現有長有短,皆體現在《瀛奎律髓刊誤》的點評中。如評《登鵲山》云:“生硬晦澀,是江西派過求瘦硬之病。”⁴¹ 評《元日》:“江西習氣太重。”評《放懷》:“後山風格本高,惟沾染江西習氣,有粗硬太甚處耳。”皆見紀氏不滿江西詩,在過於粗硬的習氣,是爲後山之短。這是他的宗唐立場。再者可循兩個方面追尋“不失爲北宋巨手”的意義內涵,即後山之長。一是紀氏常以“老”言後山詩,如“老健”(評《登快哉亭》、《早起》、《九日寄秦觀》、《別鄉舊》、《寄張文潛舍人》)、“老成”(評《立春》)、“老潔”(評《次韻晁無斁》、《秋懷示黃預》、《湖上晚歸寄詩友》)、“老境”(評《寄無斁》)等;二是他評詩往往表現與期望有落差:“輕滑,不似後山”(評《答田生》)、“淺率,不類後山”(評《雪後》)、“通體皆俗,後山不應至此”(評《和黃預久雨》)、“俗格,不似後山之筆”(評《病中六首》)。參考紀氏以老說詩,他評晁冲之說:“似平易而極深穩,斯爲老筆。”(評《感梅憶王立之》)評曾幾說:“淺語卻極自然,熟語卻不陳腐,此爲老境。”(評《雪作》)⁴² 則後山諸評,意在賞識其部分詩作於平易自然而深穩妥帖中,有不陳腐的一面,要之“情真格老”(評《寄外舅郭大夫》)、“自然閑雅”(評《早春》)是紀

39 紀昀:《後山集鈔序》。

40 紀昀:《後山集鈔序》。

41 紀昀諸評見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彙評》。《元日》,頁 577;《放懷》,頁 978;《登快哉亭》,頁 17;《早起》,頁 524;《九日寄秦觀》,頁 636;《別鄉舊》,頁 1064;《寄張文潛舍人》,頁 1134;《立春》,頁 376;《次韻晁無斁》,頁 377;《秋懷示黃預》,頁 444;《湖上晚歸寄詩友》,頁 547;《寄無斁》,頁 667;《答田生》,頁 733;《雪後》,頁 867;《和黃預久雨》,頁 670;《病中六首》,頁 1584;《寄外舅郭大夫》,頁 1500;《早春》,頁 351;《放懷》,頁 978;《鉅野泊觸事》,頁 1398;《寄文潛無咎少游三學士》,頁 1527。

42 紀昀評晁叔用及曾幾詩載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彙評》,卷 20,頁 761;卷 21,頁 892。

氏對後山“不自掩其性情”的最高評價。⁴³又他屢以“峭健”為評（評《放懷》、《鉅野泊觸事》、《寄文潛無咎少游三學士》），是也能體認後山詩的筆力。循此再看他的“不似後山”諸評，皆出現在“輕滑”、“淺率”、“俗”等印象之後，便見個中底蘊；紀昀是藉後山詩之高者批評唐詩派所反對的清初以來不善變的宋詩的鄙俚淺俗一面。後山詩偶有此病，但不是他的主流風格。作為唐宋詩的折衷論者，他不滿江西過求瘦硬之弊，但接受能有自家面目的、雖僻澀而格老的宋詩，肯定“老”為中國詩歌的一種典型；⁴⁴就後山詩的這些長處，紀昀客觀適度地調升了他在北宋詩史上的地位。

主肌理說的翁方綱（1733—1818）於江西“三宗”獨標山谷高大，《石洲詩話》（卷4）中屢貶二陳學杜不逮，而後山稍勝：“吳孟舉之鈔宋詩……以陳後山、簡齋為少陵……皆此一家之言浸淫灌注，而莫可復返，謂率天下而禍仁義者。”“自後山、簡齋抗懷師杜，所以未造其域者，氣力不均耳。”（簡齋）大約仿佛後山之學杜，而氣韻又不逮。蓋同一未得杜神，而後山尚有樸氣，簡齋則不免有僞氣矣。⁴⁵二陳中再貶簡齋是認為他只格調似杜，對後山則有所保留：“後山極意仿杜，固不得杜之精華，然與吞剝者終有間。即以中間有生用杜句者，亦不似元遺山之矯變，亦不似李空同之整齊，蓋此等處尚有樸拙之氣存焉。”⁴⁶雖仍有生用杜句之弊，但後山不做作和不模擬，尚有一份樸拙自然的自家面目。實則樸拙正是後山的創作主張：“寧拙毋巧，寧樸毋華。”覃溪所許，在其真性情，符合肌理兼重學問性情的主張。又他最重杜詩的質實氣力，曰學者稍偏一隅，即不得其正；痛斥《宋詩鈔》以後山、簡齋為杜，正在氣力有偏。這也是他指後山不及山谷之處：“愚觀宋詩之枯淡者，惟梅聖俞可以當之，若後山則益無

43 鄭騫說：“自然閑雅，亦後山詩佳處之一，不僅此首為然，前人論後山，多未注意及此。”又說：“紀曉嵐多持平之論。”（《後山詩輯評》）見鄭騫：《陳後山年譜》（臺北：聯經出版社，1984年），頁137。

44 楊子彥《論“老”作為文論範疇的發生與發展》提到在詩之“老”的系統和深化過程中，紀昀曾作過解釋。楊子彥：《論“老”作為文論範疇的發生與發展》，《文學評論》，2005年第3期，頁43。

45 翁方綱：《石洲詩話》，見郭紹虞主編：《談龍錄·石洲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卷4，頁137、142、129。

46 同上，頁122。

可回味處，豈得以枯淡爲辭耶？若黃詩之深之大，又豈後山所可比肩者。”⁴⁷ “自山谷以下，後來語學杜者，率以後山、簡齋並稱，然而後山似黃，簡齋則似杜，後山近於黃而太膚淺，簡齋近於杜而全滯色相矣。”⁴⁸ 膚淺相對深大，山谷的深與大是覃溪所看重的質厚和窮形盡變，乃就詩中體現之肌理言之，肌理可救神韻之虛；他認爲以後山之樸拙，未能深度表現詩歌的精神氣韻。要之覃溪思考宋詩，其實是藉貶抑後山而表現“一衷諸理”的詩說要領而已。

同期的李調元(1734—1803)，其論詩取向雖異於覃溪，但也認爲詩可衷於理，要有理趣。⁴⁹ 他和覃溪一樣，指後山詩無餘味：

西江詩派，余素不喜，以其空硬生湊，如貧人捉襟見肘，寒酸氣太重也……後山詩則味如嚼蜡，讀之令人氣短……真謂之不解詩可也。擁被呻吟，直是枯腸無處搜耳。⁵⁰

但覃溪嫌後山不能深度表現義理，雨村則意在不見天機與缺乏理趣。雨村與袁枚(1716—1797)皆由性靈說詩，不避淺俗，而後者更具包容精神，不排斥理語入詩，稱後山詩中有些理語“何嘗非詩家上乘”，⁵¹ 表示欣賞。可見乾隆朝後期，各家詩說其實都能廣泛吸納前代詩學觀念。

方東樹(1772—1851)主桐城詩說，力舉山谷而貶後山才力不及，非唐宋大家。道光十九年所編《昭昧詹言》卷10 黃山谷後附“陳後山”六則，多引姚範之論，指後山學杜而“不識其混茫飛動，沈鬱頓挫，而溺其鈍澀迂拙以爲高”；學黃

47 同上。

48 翁方綱：《七言律詩鈔·凡例》，見傅璇琮編：《黃庭堅和江西詩派資料彙編》(下)，頁575。

49 李調元：《雨村詩話序》(十六卷本)云：“詩衷於理，要有理趣，勿墮理障。”載詹杭倫、沈時蓉校正：《雨村詩話校正》(成都：巴蜀書社，2006年)，頁26。

50 同上，頁22。

51 袁枚：《隨園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卷3，頁94。蔣寅於《袁枚性靈詩學的解構傾向》說袁枚不排斥理語，耐人尋味，這表明他不執著於任何觀念，即便是常爲詩家拒斥的理語，也毫不拘泥地加以包容，同時又注意適當的限度，以防墮於枯燥迂腐。蔣寅：《袁枚性靈詩學的解構傾向》，《文學遺產》，2013年第2期，頁5。

而“外貌枯槁”，“不得其瑰瑋卓詭，天骨開張，而耽乎洗剝渺寂以爲奇”。方東樹以爲後山的不及，並非學力不至，而是天分不足：“愚嘗細商其故，此非學之不至，得其粗似而遺其神明精神之用云爾也。直由其天才不强耳……又後山用意求與人遠，但過深，轉竭索無味，又時磊磈不合，此不可謂非山谷遺之病也。”⁵²所謂山谷遺病，乃指他亦“時有磊磈不合，枯促寡味處”（卷10），是創作中“矯敝滑易，用思太過”的問題，說的其實是宋詩主意之弊，則天分學力之間，後山詩少了一份“不自人間來”（卷10）之奇。這似乎又回到漁洋的“鈍根”之評上了，事實上姚範確曾提到這故實，有意思的是他爲後山挽回一點面子：“新城雖不落鈍根，而深造孤詣，卓然自立，遠不逮後山。”（卷10）桐城於詩，亦才學兩不偏廢。方東樹作爲桐城後期詩論家，於才學之外，也強調詩法，⁵³說到底宋詩的避熟創新，以文爲詩，是他們認爲善學唐的表現。但方東樹對後山學黃的肯定力度雖比姚範稍大：“陳後山雖僅得其清鍊沉健、洗剝渺寂之一體，而終勝冶態凡響近境者也。”（卷10）卻終因他“鈍拙”（卷1）而未在唐宋詩史上賦予重要地位：“千餘年詩家，除大曆、長慶溫、李、西崑諸小乘翦記不論，其餘名家，無不爲杜、李、韓、蘇、黃五家嗣法派者。……故後世詩人只可謂之學李、杜、韓、蘇、黃而不能變，不可謂能變選詩也。”（卷1）後山學古不僅不善變，就連學也未學到家：“後山五七古學杜、韓，其不可人意者，殆如桓宣武之似劉司空。其五古，意境句格，森沈淡澀之致，於老杜亦虎賁之似，而無老杜之雄鬱混茫奇偉之境，其五七律，清純沉健，一削冶態瘁音，亦未可輕蔑。”（卷10）指出後山學杜五七律尚有可取，但五古僅見其森沈淡澀之致，而無老杜雄渾奇偉之境，故未能與於大家之列。

嘉道之間的潘德輿（1785—1839）著重詩教，主張詩品出於人品，開啓清末宋詩派重新發掘後山詩藝術價值的先聲。潘德輿於《養一齋詩話》中大力推許後山詩表現的人品：“品甚超，詞甚激，正是好高志古，不浪結納者，口吻何爲不高古哉？無己安貧守道，窮屢以死，豈肯爲顧影賣弄之詞！”又評其《芍藥》詩

52 方東樹著，汪紹楹校點：《昭昧詹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卷10，頁231。

53 郭前孔說桐城論詩，主以學爲才，至方東樹更兼重學力學識與詩法三者。見郭前孔：《論方東樹及道咸年間姚門弟子的唐宋詩觀》，《濟南大學學報》，2012年第3期，頁44。

云：“此真眼空一世，無人之見者存也，銜耀干進者胸次有此等語邪！”⁵⁴蓋以後山符合他對詩人品格高境的要求。至於後山的學杜，四農語重心長：“予讀陳後山集，而歎杜之未易學，而不可以不學也。杜詩沈而雄，鬱而透，後山只得其沈鬱，而雄力透空處不能得之，故彌望皆晦僂之氣。然使假以大年，功力至到，則鋒鍛洞穿，其所造必在山谷上。”（卷6）後山學杜尚未徹悟通透，是因杜詩不易學，若非命短，成就或出山谷之上，不無憐惜之情，更提示《示三子》等詩“沛然至性中流出，而筆力沈摯又足以副之，雖使老杜復生不能過”（卷6），而終肯定了後山的詩史地位：“以用力於杜者久，故下筆深重，為一代作家而有餘。”（卷6）

由乾隆早期的詩史地位仍未顯，到紀昀的“不失為北宋巨手”，再到潘德輿的“一代作家而有餘”，後山的宋代詩史地位，漸次提升。總觀清代中葉，除了唐詩派由瘦硬一筆否定外，其餘的論者多能從折衷角度，結合後山的學杜表現，體認其詩除了瘦硬之外，更具老健、樸拙、理語上乘、深造孤詣、筆力沉摯等藝術特點。這是由於到了清代中葉，各家都認同學問與性情並重的詩學觀念，不再單以學問為詩來評定宋詩的價值，可體認清人對宋詩的接受歷程，但清人長期接受的是蘇、黃豪放奇崛的詩風，只接受後山部分的作品。紀昀的“棄短取長”、“自露本質”的寬容態度摒除清初以來的唐宋門戶之見，起著一定的啓示作用。⁵⁵ 翁方綱和方東樹都肯定了後山能有自家面目，“尚有樸拙之氣存焉”，“終勝治態凡響近境者也”，便是指其性情的表現未可忽視。又論者往往說後山無才，漁洋“鈍根”之評在這階段重覆出現四次，⁵⁶方東樹更直言其天才不強，再評“鈍拙”；才弱，故不善變，紀昀說他學韓、黃少變化，翁方綱不滿他未

54 潘德輿：《養一齋詩話》，見丁福保編：《清詩話續編》，卷8，頁2127。

55 鄭騫《後山詩輯評》指紀昀《後山集提要》末二句（“棄短取長，固不失為北宋巨手”）精切公允，能摒除明末清初諸人的唐宋門戶之見。見鄭騫：《陳後山年譜》，頁146。

56 《後山集提要》云：“王士禎至指為鈍根，要亦門戶之私，非篤論也。”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154。翁方綱《石洲詩話》卷4云：“昔漁洋先生嘗疑天社之語未盡然，而謂後山終落鈍根，視蘇黃遠矣。”郭紹虞主編：《談龍錄·石洲詩話》，頁122。方東樹引姚範語：“新城云：‘後山詩反覆觀之，終落鈍根。’按此意不可不知”方東樹著，汪紹楹校點：《昭昧詹言》，卷10，頁230。另傅璇琮編：《黃庭堅和江西詩派資料彙編》（下）載宋顧樂《夢曉樓隨筆》一條，所引與漁洋語相同：“然余反覆其詩，終落鈍根，視蘇黃不逮遠矣。”頁563。

能窮形盡變，方東樹沒把他置於善變的大家行列，因此未能帶出唐宋以來的詩史作用。紀昀所說的北宋巨手，只就一代言之；嘉道間的潘德輿從品格高古與沛然至性，許後山爲一代作家，論述根據異於前期，屬道咸宋詩派“詩品出於人品”的詩論系統。事實上，此期清人多不滿後山詩的枯澀無味，固與其詩的精神氣象不合時代要求有關，但也有校勘家於爬梳細讀中，感其情真，表示欣賞，乾隆四十年夏末，與戴震友善的盧文弨（1717—1795）在《後山詩注跋》中說：

後山之詩，於澹泊中醇醇乎有醇味，其境皆真境，其情皆真情，故能引人之情，相與流連往復，而不能自己。然當時亦以愛之者絕少，況後世哉！余年五十八始讀而善之，向以黃、陳並稱，余尚嫌黃之有客氣也。⁵⁷

純由文學欣賞的角度，體認由創作主體出發的淡泊中的真摯情味，實與數十年後的潘德輿遙相呼應，其言也帶出後山詩長期寂寞的訊息。

三

道咸至清末，沿前期論者對宋詩的接受，後山詩逐漸得到較大的認同，特別是清末同光體詩人，除了表揚詩人品格，確認詩作藝術價值外，更把後山放入唐宋詩的發展脈絡中，予以中國詩史的重要席位。

道光後詩家推尊後山的，如下啓同光派的江湜（1818—1866）評其風格爲“句律清奇”，⁵⁸又徐嘉（1834—1913）《題蘇門六君子詩文集擬顏延年五君詠體·後山集》云：“布衣薦教授，擇仕辭華軒。瓣香祝南豐，雲氣飛彭門。潁川賸馥丐，泗水奔流渾。荒祠昔游眺，名並韓蘇尊。”⁵⁹將後山超越山谷，前所未有的

57 盧文弨：《抱經堂文集》，見《四部叢刊初篇》，第97冊，卷13，頁123。

58 江湜《彭表丈屢賞拙詩抱愧實多爲長句見意》有句：“旅懷伊鬱孟東野，句律清奇陳後山。他日無成還志短，詩名幸與二君班。”江湜著；左鵬軍校點：《伏敵堂詩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86。

59 徐嘉：《味靜齋集》，載傅璇琮編：《黃庭堅和江西詩派資料彙編》（下），卷8，頁586。

地與韓、蘇齊名，這來自對詩人高潔品格的仰慕。但實則其時後山詩仍未見廣泛流傳，由著名藏書家丁丙（1832—1899）敘任淵注本的刻印，可知大概，他說朱熹已歎任本“世無完集”，清初錢曾“僅而得見”舊版行世，“今距遵王（錢曾）時又二百餘年，傳本更稀”。⁶⁰ 把深埋故紙堆中的後山詩重新賦予詩史席位的，是近代宋詩派的論者。光緒時黃統（1888—1952）於《邵亭詩草序》引道咸時宋詩派莫友芝（1811—1871）詩論云：

昔人以子美爲一祖，以山谷、後山、簡齋爲三宗，謂子美不可學，學子美宜徑二陳、涪翁而泝上之。此其言本不足括唐宋詩家，後人學詩亦多不由此；然而扶質以樹敦厚之教，亦庶幾焉。道光中，家大父守遵義，（莫）子偲……縱言及詩，則曰：“品詩者謂杜聖、李仙，是子美詩孔子也，昌黎當詩孟子，唐義山、宋山谷、二陳，其詩之孫卿、子雲乎？”⁶¹

在後人可學習的唐宋詩家中，後山是其中一個代表。其後同光派更進一步認爲後山於唐宋詩史中有不可忽視的重要地位。

近代宋詩派本寬容的詩史觀，打通唐宋詩爲一體，同光派的代表詩論家陳衍（1856—1937）在確認詩歌傳統時，無論在討論唐宋詩之傳承關係、宋人本唐詩而擴充變化、宋代詩學承傳，以至道光以來詩學的兩個風格派別等問題時，都突出了後山的詩史地位：

自咸同以來，言詩者喜分唐宋，每謂某也學唐詩，某也學宋詩。余謂唐詩至杜、韓以下，現諸變相。蘇、王、黃、陳、楊、陸諸家，沿其波而參互錯綜，變本加厲耳。⁶²

余言今人強分唐詩宋詩，宋人皆推本唐人詩法，力破餘地耳。廬陵、宛

60 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目錄，第927冊，卷28，頁483上。

61 黃統：《邵亭詩草序》，載傅璇琮編：《黃庭堅和江西詩派資料彙編》（上），頁350。

62 陳衍：《石遺室詩話》，載錢仲聯編校：《陳衍詩論合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卷14，頁200。

陵、東坡、臨川、山谷、後山、放翁、誠齋，岑、高、李、杜、韓、孟、劉、白之變化也；簡齋、止齋、滄浪、四靈，王、孟、韋、柳、賈島、姚合之變化也。⁶³

呂居仁作《西江宗派圖》，則首黃山谷，次陳後山，其餘徐俯、韓駒……等二十餘人，為西江派。（下敘南宋諸家）誠齋數千首，學香山而參以半山、後山，自序亦略言之。⁶⁴

前清詩學，道光以來，一大關捩。略分兩派：一派清蒼幽峭，自《古詩十九首》、蘇、李、陶、謝、王、韋、柳以下，逮賈島、姚合，宋之陳師道、陳與義、陳傅良、趙師秀……譚元春之倫，洗鍊而鎔鑄之，體會淵微，出以精思健筆。其一派生澀奧衍，自急就章、鼓吹詞、饒歌十八曲以下，逮韓愈、孟郊、樊宗師……黃道周之倫，皆所取法。語必驚人，字忌習見。⁶⁵

後山詩被賦予新的詩史價值，於唐宋至清的承傳變化中起著積極作用。

同光派一反前人對後山詩的貶抑態度，固然是本於詩人合一的論詩主張，背後實也深藏時代文化的心理因素。陳衍評後山學杜雖亦有褒有貶，⁶⁶但對後山其人其詩，推崇者多，觀《石遺室文續集》中《祭陳後山先生文》一篇可知其詳。1914年12月29日，夏敬觀、陳衡恪、黃節等十三位在京詩人，感於後山“高介有節，因寒凍病卒”，在憫忠寺記念他的814年忌辰，由陳衍主祭。文中對後山深表哀惜之情：

守死善道，先生有焉。先生之操行，可謂不朽矣。嗚呼！自詩人少達多窮之說起，不以爲詩能窮人，即以爲窮而後工，然自少陵、東野、玉川、長

⁶³ 同上，卷1，頁9。

⁶⁴ 陳衍：《詩學概要》，載錢仲聯編校：《陳衍詩論合集》，頁1038。又《石遺室詩話》中論誠齋七絕時，指善學之可上追梅堯臣與後山，載錢仲聯編校：《陳衍詩論合集》，卷16，頁228。

⁶⁵ 陳衍：《石遺室詩話》，載《陳衍詩論合集》，卷3，頁37。

⁶⁶ 陳衍《石遺室文集·重刻晚翠軒詩敘》云：“後山學杜，其精者突過山谷，然粗澀者往往不類詩語。”載陳衍撰；陳步編：《陳石遺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卷9，頁505。《石遺室詩話》云：“李義山、陳後山詩，有非注斷斷不知其好處者，得注乃歎其真善學杜。”卷3，頁36。同書云：“後山七律，結聯多用澀語對收，則學杜而得皮者。”卷19，頁258。

江以下，迨聖俞與先生，工而窮者不過數公。以先生之特立獨行，守道固窮……況窮之境不一，工之境不同，彼有唐之昌黎、元、白，有宋之歐、蘇、荊公雖窮通之相間，亦未嘗以凍餒終。惟言者心之聲……終景仰於先生曠世之高風。⁶⁷

歎其際遇之窮，譽其操行之高。祭文首先將後山之“窮而工”上承杜甫，與梅堯臣同列，肯定其創作生命的價值，⁶⁸再就言為心聲的理論根據，指後山之工，與韓、歐等唐宋大家不同，是因他們能窮通相間，而後山卻一生終窮，故發為不同聲音，後山抒發的正是守道固窮之音。由“窮之境不一”而論斷“工之境不一”，藝術價值來自其人的生平言行，陳衍實由詩教角度賦予後山詩史高位，其文又透現他們起後山於地下的當世意義：

然千百年來，天下之言詩者，莫不知有先生，而儕之杜老與蘇、黃，況今日道喪文敝，士大夫方馳驚於利祿聞達之場，歌舞飲博，酣嬉而若狂，猶有人焉。天寒歲暮，集於荒涼寂寞之鄉，為位設奠，慨慕徜徉，不厭其無益，不惡其不祥，豈非先生之學之行，非尋常詩人所及，使百世興起而不能忘歟。⁶⁹

以後山之不凡學行與守道而終，反諷清末社會的日趨衰敗。陳氏以“淡淡靛青轆頭”（《石遺室詩話》卷23）比擬後山詩的色澤，便意在其“非尋常脂粉”，表現崇高的藝術意義，與方回“不可與拈花簇葉者相較量”之評遙相呼應。⁷⁰

同光派末代詩人曾克崙（1900—1975）在《論同光體詩》中，補充他們重新

67 陳衍：《石遺室文續集》，載陳衍撰；陳步編：《陳石遺集》，頁590。

68 梅堯臣也是同光體重新發掘出來的被遺忘的宋代詩人，見曾克崙：《論同光體詩》，載鄭健行、吳淑鈿編：《香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論文選粹 1950—2000》（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11。

69 陳衍：《石遺室文續集》，載陳衍撰；陳步編：《陳石遺集》，頁589。

70 方回《瀛奎律髓》評《元日》云：“讀後山詩，若以色見，以聲音求，是行邪道，不見如來，全是骨，全是味，不可與拈花簇葉者相較量也。”載《瀛奎律髓彙評》，卷16，頁577。

肯定後山詩的原因。同光詩人認為做詩不易，論詩更不易，“恐怕還是各人個性關係”，故重新評價夙享盛名的詩學大師，也重新探索及宣揚被遺忘的詩人，旨在給學詩者開出無數法門，指示無限途徑。⁷¹ 後山是被遺忘詩人之一。曾氏云：

後山之詩，皆閉門苦吟而得，而通於禪意，如云“如參曹洞禪，忌犯正位，切忌死語”。所以他能够在杜、黃而後自成一宗。楊昉谷在法源寺祭陳後山詩，有“知陳最深者三賢，曾鞏蘇軾黃庭堅……吾曹論古何敢偏，窮源要溯天中天，梅陳好句絕可愛，其力僅足造一關，強譽一家冠千古，逆知古人心未安”的句子。而學後山最有名的，在福建當推林暉谷、陳徵宇，在廣東只有黃晦聞，此外並不多見，因為他的詩自苦吟得來，所以性情樂易豪放的便不與之相近也。⁷²

其言可分三層探究，首先他指後山詩可活參，於杜、黃後出為自家面目，這與同光派由個性學詩的觀念有關。曾氏說：“同光派對於杜，無論學得到學不到，都是一致推崇。”⁷³理由是杜詩不易學，杜骨也不易學；言外指後山得杜骨，乃性情所自，已是一得。其次同光詩人雖認為後山與聖俞好句絕可愛，但只通一關。沈曾植有元祐、元和、元嘉的“三關”說，學詩須由下而上學；曾氏意謂後山詩成就雖未達千古，但能通中唐。最後曾氏說其時學後山詩的人其實不多，與個性各自不同有關。綜言之，後山詩由於苦吟，雖表現獨特性情，但讀者不多，影響亦不大，所以需重新發掘。無論如何，一代寂寞的後山詩，經同光派之提倡，任淵之後，近代多了一個著名的冒廣生箋注本。⁷⁴

清代中葉以降後山於宋詩之地位有所提升，到了清末，由於近代宋詩派主

71 曾克崙：《論同光體詩》，載鄭健行、吳淑鈿編：《香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論文選粹 1950—2000》，頁 8。

72 同上，頁 12。

73 同上，頁 8。

74 冒廣生箋注《後山詩注補箋》由商務印書館於 1936 年出版，“前言”敘成書經過，見中華書局 1999 年版，頁 1—3。

張“詩與人一”，及有感時代文化的危機，把後山詩重新發掘出來，既追尊其學行之高，也肯定他在唐宋詩變遷及“清蒼幽峭”一派的風格發展中所起積極作用，賦予他新的詩史地位。觀乎後山詩於此階段終得價值之回歸，與“二陳”中的簡齋實有相似之處。陳與義詩也是經歷清初以來的屢被貶抑，最後纔由同光派確立他在唐宋詩史中的地位。但“二陳”相對山谷，雖長期被歸為同類，彼此在清代詩論中的地位高低，頗有不同。簡齋早期處後山之下，反對明人復古只講格調的論者指他學杜得其肉，滯於色相；其後紀昀以為簡齋善變江西，相對後山，可高置一席；清末夏敬觀強調簡齋於南北宋間的轉折作用，也因能變江西面目，評為“不在師道之下”。⁷⁵ 綜言之，“二陳”中，後山地位不及簡齋，由此側面反映清人不滿瘦硬枯澀和重視創造性的詩學觀念。

總觀有清一代，後山詩由被忽視至被推尊，詩史地位由隱而顯，經歷曲折。宋代時被稱格高意深的後山詩，在成為方回建構的江西“三宗”之一後，明清幾百年間，結合他的學杜表現，屢被評為山谷之下，至清尤甚。清初論者從時代文化心理出發，於宋詩只欣賞蘇、黃的雄豪與筆力，指後山詩典重牽強，學杜不如，雖偶有賞識的讀者，總的來說是長期被貶抑，在清初的宗唐風氣中寂寂無聞。乾隆盛世，時代具包容精神，紀昀以持平的眼光，指詩人學杜有善有不善，於江西習氣之外，猶能見其性情，在前期查慎行“樸老孤峭”的評價上，落實了後山詩“老”、“健”風格的一面，並予以“不失為北宋巨手”的詩史地位。見清人對宋詩風格之“老”的成熟接受。此後潘德輿由其人的安貧守道，與其詩的筆力沉摯，於杜詩不易學的前提下，肯定後山為“一代作家而有餘”的詩教典範。後山作為宋詩代表的地位得到鞏固。至清末同光派，由於社會的日趨衰敗，尊仰後山守道固窮的高潔品行，重新探索及宣揚他的詩學價值，在道光以來的兩種風格典型中，把後山歸入“清蒼幽峭”一派，在洗煉鎔鑄、體會深微、精思健筆等藝術創造與體認上，其實是回應了清初《宋詩鈔》的典重意深、講法度、有筆力的評價，要之方東樹“得清煉沉健、洗剥渺寂一體”之評可以當之。後山詩終脫離長期與“二宗”較量的處境，以自家面目獨立千古，與同光派“自覺”的論詩態

75 夏敬觀：《陳與義詩·導言》（臺北：商務印書館，1975年），頁1。

度有關，曾克崙說他們不輕信古人說法，致力作新評價和新探索，於是湮沒的古人得到宣揚。⁷⁶ 又清人長期批評後山天分不高，故未能學杜而窮形盡變，清末他能在唐宋詩史中佔一席位，與同光派“詩人合一”的創作觀和“唐宋一體”的詩史觀有關。詩人合一，後山改在“窮而工”的創作生命底蘊接軌杜甫；唐宋既為一體，則詩之變相是一種內在的集體的律動，推本唐人詩法，力破餘地，不祇是個別作家的藝術修行，而由歐陽修到四靈等一代詩人的造詣共同體現。不再孤立考察後山詩在唐詩與宋詩間的變化作用，於是他參與了“清蒼幽峭”這種風格典型的承傳與創造，影響及於清末詩壇；終清一代，後山詩雖傳播不廣，但他在唐宋詩史上的地位由此得到一定的彰顯。才氣乃天生，性情亦不能勉強，後山詩帶著詩人先天的獨特個性與後天的道德品格經歷漫長歲月至近代終被肯定，意味個體生命的開發受到重視，其中實包藏我國文化發展過程中人文觀念的啓蒙。

（作者：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

76 曾克崙：《論同光體詩》，載鄭健行、吳淑鈿編：《香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論文選粹 1950—2000》，頁8。

引用書目

一、專書

- 丁福保輯：《清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 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方東樹著，汪紹楹校點：《昭昧詹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
- 王士禛著，張宗柟纂集：《帶經堂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
- 王應奎：《柳南隨筆》。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朱鑄禹校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 江湜：《伏敵堂詩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 吳文治主編：《明詩話全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
- 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彙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 冒廣生補箋：《後山詩注補箋》。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 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30年。
- 紀昀：《紀曉嵐詩文集》。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
- 郎瑛：《七修類稿》。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 夏敬觀：《陳與義詩》。臺北：商務印書館，1975年。
- 袁枚：《隨園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
- 郭紹虞主編：《原詩·一瓢詩話·說詩晬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
- 郭紹虞主編：《清詩話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 郭紹虞主編：《滄浪詩話校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
- 郭紹虞主編：《談龍錄·石洲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 陳衍撰，陳步編：《陳石遺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
- 陳衍撰，錢仲聯編校：《陳衍詩論合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
- 傅璇琮編：《黃庭堅和江西詩派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 葛立方：《韻語陽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 詹杭倫、沈時蓉校正：《雨村詩話校正》。成都：巴蜀書社，2006年。

鄭騫：《陳後山年譜》。臺北：聯經出版社，1984 年。

錢泰吉：《甘泉鄉人稿》。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 年。

錢曾：《讀書敏求記》。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4 年。

鄭健行、吳淑鈿編：《香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論文選粹 1950—2000》。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年。

顧廷龍主編：《詩歌總集叢刊》。上海：三聯書店，1988 年。

二、論文

吳淑鈿：《一祖三宗說與陳簡齋的詩學定位》，《學術研究》，2014 年第 2 期，頁 135—144。

郭前孔：《論方東樹及道咸年間姚門弟子的唐宋詩觀》，《濟南大學學報》，2012 年第 3 期，頁 41—45。

楊子彥：《論“老”作為文論範疇的發生與發展》，《文學評論》，2005 年第 3 期，頁 40—46。

蔣寅：《袁枚性靈詩學的解構傾向》，《文學遺產》，2013 年第 2 期，頁 5—17。

Comments on Houshan Poetry and Its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Poem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NG Suk Ti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oems of Chen Shidao (Houshan) received very positive reviews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Honored by Fang Hui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as one of the Three Masters of the Jiangxi Poetry School, Chen was hailed as one of the best emulators of Du Fu. Song Poetry, especially the style of the Jiangxi School, was belittled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Chen's poems, being examined through their emulation of Du Fu, received both criticism and praise. Chen was rarely acclaimed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His poems were denounced as awkward, slow-witted, withered and dull. During the reign of Qianlong, Ji Yun was arguably the only one who occasionally made fair comments on his work. It was not until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that Chen's style was recognized by the Tong Guang poets as having an important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Tang and Song poetry. This paper endeavors to explore the history of reception of Chen's poems since the Qing Dynasty, aiming to trace the course of transmission of Chen's poetry in the midst of all the negative reviews. Hopefully this will contribute an important supplementary dimension to the study of Song poetics in the Qing Dynasty.

Keywords: Thin-stiff style and austere expression, slow-wittedness, observe the Way and persist through poverty, History of Tang and Song Poetry